

doi:10.3969/j.issn.1672-626x.2013.02.020

马克思文化批判思想的两个向度及其当代意义

管锦绣,张三元

(武汉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

摘要:文化创新的论题是以文化批判为前提的。马克思的文化批判思想包含着两个向度——工具理性的批判和传统文化的批判。马克思的文化批判思想是对启蒙理性精神的传承,是在文化批判的两个向度中诉说着现代性的价值取向的。在我国大力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全面推进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认识马克思的文化批判思想及其所彰显的现代性价值取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文化批判;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26X(2013)02-0114-05

从哲学层面讲,任何创新都是破旧立新,创新的前提是批判,本文正是基于文化创新的前提来探讨文化批判。文化批判并非脱离现实的哲学玄思,而是面向现实生活的“应然”层面之探讨。当前的社会现实既不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头脑中理想的“大同社会”,也不是农业文明下的“熟人社会”,而是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世俗生活。因此,在我国的现代化稳步推进时需要在文化层面上批判工具理性霸权,在我们弘扬传统文化的同时不要忘却对传统文化的批判。马克思的文化批判思想是对启蒙理性的继承,其启蒙理性的话语中包含着丰富的现代性价值取向,并在现代性价值取向中诉说着两种有悖于启蒙理性的文化批判向度——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工具理性霸权的批判。

一

在遵行“经济人”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原则而运行的市场经济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同时,“人的陌生化”社会逐渐地取代了“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里,传统小农经济发展出的是“熟人”间的合作关系,人们更崇尚人性的善和崇高性的一面;在“人的陌生化”社会里,充满算计的博弈取代了传统社会“熟人”间的合作,人性中的善和崇高性的一面逐

渐让位于人性中自私性、自利性的一面。当缺乏相应的社会监督机制时,“人的陌生化”必将导致人们之间相互不信任,从而形成交往的高风险性,人们只能转而求助于“自保”,不信任和冷漠感就随之产生了。在面临高风险的市场经济时,小农意识中悲天悯人的内容往往表现为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于是,传统文化中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小农意识与市场经济下的拜物教意识相互杂合,不断地冲击着传统道德的禁区。

对于小农意识的狭隘性和自私性,马克思持有鲜明的批判态度。他认为小农意识依托于农村公社,由于农村公社“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1](P148)]因而农村公社所孕育的小农意识体现着“人的不开化的利己性”,“人们屈服于环境,而不是把人提升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况变成了一成不变的由自然预定的命运,因而造成了野蛮的崇拜自然的迷信。”^[1](P149)]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的基本精神是理性精神,理性精神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演绎了现代化的进程,现代化的历史是以理性精神来展现人类主体性的历史,现代性因而具有了历史的进

收稿日期:2013-02-28

基金项目:2012 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2G313);2009 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09BZX007)

作者简介:管锦绣(1972-),女,湖北蕲春人,武汉工程大学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研究;张三元(1962-),男,湖北红安人,武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所所长,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步意义,它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谱写了人类解放的重要诗篇。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人类解放的历史进程出发,马克思有力地批判了种种有悖于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的传统文化内容,包括小农意识以及与此相关的宗教思想、等级意识,从而肯定了现代性的历史进步意义。

首先,现代性的理性精神在批判和克服小农意识和等级意识中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2](P20)}在社会的理性化进程中,“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2](P19)}进而,马克思把现代性放到人类文明进步的宏大历史背景下进行整体地思考,在资本全球化历史语境下,马克思看到了现代化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现代性的历史必然性,“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3](P8)}

其次,马克思还特别地把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现代工业的发展看作是启蒙理性的展现,“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一起变革了整个自然界,结束了人们对于自然界的幼稚态度和幼稚行为”。^[4]在马克思看来,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必需和必然的一环,自由市场经济、人的主体性、理性技术和民主,这些都是现代化不可或缺的要素。只有在生产力普遍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从而“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5]从而扬弃阶级自身的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

面对当前的道德滑坡现象,人们在哀叹人性的贪婪和冷漠的同时,往往会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具理性,把这些道德层面的问题归咎于工具理性的膨胀。于是,人们在批判工具理性膨胀的同时,试图从传统文化中找到应付现实问题的灵丹妙药。甚至有学者认为,传统文化中富含丰富的人文主义关怀的理论资源,它们能有效克服工具理性膨胀之过。

传统文化中的济世情怀和圣人之德,真的是拯救当前道德滑坡问题的良方吗?很多学者早就对这

个问题给出了否定性的答案,其中的代表人物早的有李泽厚,近的有邓晓芒。在他们看来,圣人之德所倡导的人道主义关怀并不是以“自由意志”的人的主体性为前提的,相反,却是无视个体人格独立的世俗关怀;作为一种世俗关怀,圣人之德并没有建立起区别于工具理性的超验根基,“而是与工具理性一起同归于一种世俗关怀”。^[6]因此,对圣人之德的倡导并不能实现对工具理性的超越,圣人之德也由于缺乏对人权、人格和人性的尊重无法面对现代化浪潮,因而也无法实现对现实的批判。

儒家文化中的悲天悯人的内容既可以表现为批判现实的济世情怀,也可以表达为自我保全的小农意识。前者是传统知识分子应有的圣人之德,后者则是小农经济所培育起来的世俗之德。虽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传统宗法制度的组织结构已不复存在,儒家文化中那些悲天悯人的内容也因缺乏载体而无法自发地形成,更无法在整个社会层面被运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悲天悯人的内容在普通民众中完全没有存在的土壤,小农经济所培育起来的世俗之德仍然根深蒂固地影响着处于市场经济中的普通民众。抗拒现实风险能力低的小农经济培育起来的小农意识遵循的是自我保全的功利主义原则,悲天悯人内容与其说是出于对他人的同情,还不如说是根植于自我保全的需要。

因此,当前的文化建设不应简单地从传统文化中拿出一些不合时宜的内容嫁接到现在的世俗社会中,而应思考如何建构体现现代性精神的公民社会。当我们强调文化自信时,更要注意到这种自信是以对传统文化自身的“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作为前提的,这就要求我们更应该具有对传统文化批判的文化自觉意识。

二

马克思同时也认为理性所展开的工业化历史并不是一个思想演绎的过程,而是一个人类的特定生产方式在具体历史情境中变革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过程。在工业化发展进程中,现代化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确立的工具理性来运行的。

由此可见,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思想在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批判的前提下包含着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思想。这首先表现为他对“公平交换”原则的市场理性的批判和对“自行增殖”的资本理性原则的

批判。

针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滑坡现象,马克思早就指出:“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会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去冒绞首的危险。”^{[3](P329)}这是马克思对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理性对价值理性僭越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虽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决定了资本理性的贪婪,资本理性原则也反过来建构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其次,马克思的工具理性批判还包含着对异化分工的批判。

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分工表现在资本主义生产管理领域,体现了生产领域的社会技术化。“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形式来说是专制的。随着大规模协作的发展,这种专制也发展了自己特有的形式……正如军队需要军官和军士一样,在同一资本指挥下共同工作的大量工人也需要工业上的军官(经理)和军士(监工),在劳动过程中以资本的名义进行指挥。”^{[3](P368)}劳动分工对工人的控制是以技术所形成的严密的管理形式和职能分工而运行的,是适应社会化生产的管理技术。

具体来说,工场手工业的分工通过对手工活动的分解和劳动工具的专门化,出现了局部工人,造成了局部工人对分工所形成的社会劳动组织的依赖,并形成了技术所带来的分工和社会劳动组织对工人的支配。在机器大工业的条件下,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群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于是,“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3](P464)}适应于机器体系的工厂制度是资本家组织和管理机器大工业生产的技术社会化的体现。

在工厂中,为了适应机器运作,工人按比例被分配到工艺流程的各个环节进行局部操作,以此保证生产过程的连续性。按照生产过程的要求,工人被编入不同的班组,隶属于经理和监工的管理。资本家正是通过纪律、经理、监工等技术社会化的形式实现对工人的剥削和支配。

马克思还将工厂制度下的对工人劳动的强制

类比成工厂法典对工人的专制。“这种法典(工厂法典)只是对劳动过程实现社会调节的资本主义讽刺画,而这种调节是大规模协作和使用共同的劳动资料,特别是使用机器所必需的。”^{[3](P465)}这样,工厂就像一架巨型机器,每个生产组织单位都是其中的一个部件,每个工人都是其中的一个零件,都有各自的职责,工厂的纪律就是机器运转的法典,这些部件、零件只有按照机器所赋予的职责而有序协同地努力工作,才能使得工厂这架巨型机器高效地运转。于是,适应于资本主义机器体系的工厂制度“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一种全新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新人来”。^[7]新人就是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划分、归类并重构的技术化社会生产过程塑造出的人,机器的铁人构成了工人的生存方式。在这种生存方式下,机器不仅极度地损害工人的神经系统,同时又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侵吞身体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3](P465)}甚至减轻劳动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因为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

从人的价值被尊重的角度来看,马克思认为现代世界相对于古代世界而言甚至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据古典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目的。”^{[8](P486)}这就意味着,现代性并不必然地体现为人的解放,现代性所宣扬的理性,在资本主义现代化中,反而蜕变为工具理性肆意扩张的霸权,主体性的张扬导致了主体性的丧失。

对于工具理性的霸权,马克思同时代的一些学者如李嘉图也持有批判态度,但是,他们都是从价值中立的原则出发“把生产和资本的自行增殖直接看成一回事”。^{[8](P394)}对于理性原则所导致的非理性的现实,经济学家或许也承认现实的市场与理想的市场存在偏离,但他们常常把现实市场与理想市场之间的差异归因于偶然的“市场不健全”,视为一种对理想类型市场的外部妨碍,而马克思则视之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市场运转和生产方式的一种本质特征。一方面,马克思不像许多同时代的社会主义者,他不否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展现的理性原则在历史中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他也不像国

民经济学家那样将理性原则抽象化和理想化,而是把理性原则放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由此实现对理性原则背后的社会预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思想是以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扬弃为前提的,在历史进程中,由于现代性被赋予了资本主义的特有逻辑,启蒙现代性的理想蜕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因而,只有走出资本主义制度所设定的发展误区,才能使现代社会发展在批判性地继承启蒙遗产的基础上,为创建更合理的人类文明秩序开辟新的道路。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实质上是对现代性的扬弃,在他的批判性话语中有着鲜明的现代性价值取向。

三

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还不够成熟,虽然相应的市场规则已基本建立起来,但却执行乏力。从文化层面来看,这与当前缺乏公民意识的小农意识心理有关。虽然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冲击这样的文化心理,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西方的理性文化内容一引进到中国就变了味,甚至留下来的往往是其负面影响。这说明在推进文化建设过程中要以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为指导,既要强调对西方启蒙理性精神的学习,也要强调对传统文化和工具理性的批判,从而在传承的基础上实现创新。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发展”尤显窘迫,“发展是硬道理”成为当前国情的最好诠释。在尚未到达富裕阶段的中国,其“发展”面临着两次现代化的双重压力,这是不可回避的挑战,也是历史的机遇。在发达国家以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为目的的第一次现代化已完成,正在进行以探索经济持续发展来提高生活质量的第二次现代化时,中国却面临着两次现代化的压力。在选择“发展”的道路方面,中国不能越过第一次现代化而直接进入第二次现代化。虽然现代化是一把“双刃剑”,它会带来现代性问题。但是,现代化同时也体现为一个历史过程,中国的现代化本质是要在中国构建一个现代理性社会,和谐社会是理性的和谐社会,也是公民意识觉醒的社会,它以科学理性和人的主体性为特征,它倡导市场经济方针、科教兴国战略,以促进生产力快速稳健发展为目标。如果社会缺失第一次现代化,也就会失去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从而不可能实现第二次现代化。在公民社会的建构过程中,

台湾学者林安梧认为,儒学新的发展不在于“如何从‘内圣’开出‘外王’,而是如何在这‘外王’的学习过程里,慢慢调理出一种新的‘内圣’的可能”。^[9]这个学习过程就是要在现代化进程中批判传统文化中不适应市场经济、民主法治的内容,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来推进道德文化建设。

同时,我们也不能选择“先进行第一次现代化,将来再考虑第二次现代化”的方案。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关起门来独立发展,中国必须顺应历史的潮流,积极地参与全球化合作。虽然在国际合作中,在国际经济分工、经贸和政治合作、文化交流中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会面临诸多不利的局面,但是中国依然可以取长补短地参与国际合作,借鉴和利用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稳步发展。

在我国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在推进生产力和科技的快速发展、市场经济不断扩大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工具理性(以技术、商品、货币、甚至是以资本和权力的形式)对人与社会的统治,会出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冲突,这体现为现代化进程中的效率和公平难题、经济发展与道德文化建设的难题,体现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权力主义盛行,等等。这些都意味着人的自由和解放不仅仅是免除物质上的匮乏,还应该免除文化上和精神上的工具理性以“合理性名义”对人造成的压抑和统治。

由此可见,在推进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如何扬弃现代性的问题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应借鉴马克思现代性思想所包含的启蒙理性精神的基本内容,积极地推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发展科技,加速社会的理性化进程。同时,我们也要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种种拜物教意识保持高度的警觉。市场经济如何发展、科学技术的走向如何等等不仅仅是一个顺应“合理化”内在逻辑的问题,它们也有赖于我们的主体设计和价值选择。“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我国当前和未来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念,在贯彻这个理念过程中,我们必须重视制度建设,不把现代性问题看成是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的“原罪”,通过深化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改革与调整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弘扬社会主义道德,从而合理地规范工具理性。

参考文献:

- [1]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 [2]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 [3]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 [4]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240.
- [5]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39.
- [6] 邓晓芒.新批判主义[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16.
- [7]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370.
- [8]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 [9] 林安梧,欧阳康,邓晓芒,郭齐勇.中国哲学的未来: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交流互动[J].学术月刊,2007,(5).

(责任编辑:卢圣泉)

Two Aspects on Marx's Criticism of Culture and their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GUAN Jin-xiu,ZHANG San-yuan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205, China)

Abstract: Innovation of culture is based on criticism of culture. Marx's thought of criticism of culture implied two different aspects, such as criticism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of traditional culture. Marx's thought of criticism of culture, as an inheritance of the spirits of enlightenment rationality, which told the orientation of modernity value in two aspects of criticism of culture. Therefore, during liberating and advancing cultural productive force in our country's industrialization, Marx's thought of criticism of culture and orientation of modernity value, which Marx's thought of criticism of culture implied, have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realistic significance.

Key words: Marx; criticism of culture; modernity;